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 大学教授,为什么一定要做科研

■郭英剑



“教授”一词是舶来品。按照其原初及其后来发展的定义来看,“教授”这一职位的职责包括教学(为本科生、研究生等开设课程)、从事学术研究、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他们应该是国内或国际的知名学者。

没有科研成果的教师被提升为教授的典型案例,促使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谈“教学”的时候,说的是英文的 teaching,这无异议;但“科研”,其实我更想用英文中的 research 来表示。因为用中文的“科研”,好像就是科学研究,没有顾及人文学科的特点;而英文的 research,就可以被定义既是科学研究,也是学术、理论研究和创新活动。那么,何谓“研究”?说白了,“研究”就是要产出学术成果(produce scholarship),而产出学术成果,是西方很多名校赋予新入职的“助理教授”的基本任务。因为考虑到助理教授的局限性,我在本文中就使用“科研”这个词了。

## 何谓“大学教授”?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着重谈的是“大学教师”。但今天,我想把重点放在“大学教授”身上。为此,我想从何谓“大学教授”谈起。“教授”(Professor)这个词是舶来品。它来自拉丁文,其意最早为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专家。现在是高校中最高学术头衔。西方国家中,还有助理教授、副教授。虽然“教授”一词有时候也可以指所有在高校任教的老师,但这主要用在日常交流中,在高校与学术圈内,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授”,主要是指“正教授”(Full Professor)。

在西方高校中,教授的首要任务通常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从事创新性研究(original research)和为本科生、研究生等开设课程。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带研究生,指导论文。在很多高校,教授还要承担一些行政管理工作,担任校长、院长、系主任、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位高低不一,但往往都要承担这样那样的责任。一般来说,教授要比其他职位的人更多地面向大众,他们大都是各自领域的国内或国际的知名学者。

由上述简单的定位不难看出,“教授”职位的职责无外乎教学(为本科生、研究生等开设课程);从事学术研究;承担行政管理工作。被称为“教授”的人,应该是国内外的知名学者。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的职责是兼而有之,而非可以有缺项。

在当下中国的高校,人们(包括教师与管理人员)对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种种误解或者认识偏差。首先就是将教学与科研对立起来看待。很多人认为,在大学中,科研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而与本科生教育关系不大,或者不是直接关系,甚至有人以一些教授不愿上本科生课为由,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大。但事实上,这种近乎是公认的说法在当代任何一所被称为大学(university),或者虽然名称不是大学(university)而名为 institute(比如 MIT),但实际上无人否认是一所大学的高等院校中,几乎都是站不住脚的。就世界范围内而言,越是好大学或者顶尖大学,教师的科研能力越强,学校对教师科研的要求也越高。

我个人以为,对于不同类型的高校来说,可以对“教授”的职责做出一

定程度的调整,以满足自身和教师的需求,这没有错。比如我目前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置了“教学型教授”。在职务晋升时,着重评审其教学及其效果,但也对科研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当然,相对于“教学科研型教授”的科研指标来看,“教学型教授”的要求与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个人以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其合理性,也得到了大多数同事的赞同。

在一所大学中,可以不对助教、讲师甚至副教授做出科研要求,但对“教授”也如此,或许就值得商榷。当然,对于特殊人的特殊情况做出特殊处理,我完全赞同,像媒体上所宣传的几位好教师被评为副教授与教授,我也认为他们所在学校这样做是对的,我个人也很佩服他们。但就一般意义而言,如果对“教授”仅看重其“教学”,而不对其“科研”做出任何要求,哪怕是最低的要求,显然无法满足当今时代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 大学不再单纯是传播知识的场所

我曾经一再说过,当今是慕课时代,也是网络化的大学时代,仅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的太学教学已经落伍了。因为对于今天的教学来说,单纯传授或者传播知识已经很难满足个人与教学现实的需要。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于以往,这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媒体信息极速传播、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高于单纯知识传承的时代。如果单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那么,我们现在几乎所有大学的本科课堂知识,都可以在网络上、图书馆以及各种书本上找到来源。可以说,教师作为知识拥有者(甚至对于某些“绝技”来说是独有者)和传播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近年来,有若干高校奖励了几位讲课讲得好的教师,这些教师也因此被擢升为副教授或者教授。对于很多高校多年来所形成的教学为主型的教师职称评审困难,有这样的特殊政策,是现实需求所致,我也理解并赞同。但就今天的青年教师而言,这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在今天,估计无人真敢这么去等,等着到退休之后或者接近退休的年龄再被聘为副教授或者教授。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值得一提。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文章中或者在平时的交谈中,非常怀念民国时期很多学界名流的风采,称赞他们是一支粉笔、一个烟斗就走上讲台了。他们往往口吐莲花,语惊四座,深受大家欢迎。我也一再说过,不要再怀念这样的时代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的时代,第一要讲规范,如果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教学说明、没有教学要求,是否还会有学校同意授课,还会有学生选课?讲求课堂规范,已经成为世界一流高校的通行做法。而且所有课程的的教学大纲要全部上网,向学生和公众公开。第二要给教师个人魅力“祛魅”。近年来,“祛魅”(disenchantment)这个词很流行。所谓“个人魅力”“祛魅”,就是要清醒、要醒悟,不要再对教师依靠个人魅力去吸引学生抱有幻想。我不是不承认教师个人魅力对于教学的重要性,而是说,现在的

教师的个人魅力,要更多地体现在课堂本身的思想性、启发性与批评性上,比如像哈佛大学的桑德尔(Michael Sandel)那样,才是真的有魅力。第三,今天的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再也不能有教师课堂上满堂灌的现象存在了,学生不是机器,教师也不是机器,双方是要互动的。

## 教授为什么非要做科研?

那么,“教授”为什么一定要做科研呢?以教学为主型的高校,如普通的地方高校,“教授”甚至是所有序列的副教授、讲师乃至助教,都把重点放在教学上,而不对他们的科研做出要求,是否可以呢?我个人以为,从世界范围内的角度看,这难以行得通。

首先,重视科研,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教授”作为高校最高学术级别的学者,应当当仁不让。即便是在美国,即便是以教学为主型的文理学院,也都越来越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及其成果发表。

2014年5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刊物《学苑》(Academe)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结果表明,科研和教师的科研成果发表,在教师评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即便是在文理学院也不例外。在文理学院各项评估指标中,2000年,科研占比为40.5%,论文发表率为30.6%,到2010年,这两个指数分别升至51.8%和39.6%。这一研究来自对全美410所四年制文理学院校长的采访,研究者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十几年来教学评估在实践当中的变化,将2000年以来的类似数据进行对比之后,得出了上述结论。

这些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四年制文理学院,是因为这些高校一般都以教学为中心,而重视研究与发表论文则是那些研究型大学的强项。但结果表明,尽管所有校长都认为课堂教学依旧是考查教师能力的第一要素,但科研对于一位教师是否能够成为长聘教师起着关键性作用。

其次,上述研究认为,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与提高高校的知名度,获得更多社会支持,有着必然联系。在很多大学校长看来,教师要在学术界保持高能能见度,即受学术界的关注程度要高,这就是今天的游戏规则。

再次,科研促进教学,既有利于教师的创新性教学,也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一些国外大学提出,科研能够使教授成为一名更好的教师。有人提出,时代瞬息万变,唯有那些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才有能力获得并与学生交流最新知识。就教师而言,唯有研究型教师,才能更好地选取讲课内容,才知道选取什么样的重要话题与概念,也才能够以更适当的方式把知识传播给学生。

当今时代,很多国外高校认为,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对学生富有吸引力。学生参与科研或者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国外很多大学本科生教育的常态,既是吸引学生入学的一种手段,也是学校所推崇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很多大学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名声。

## 四海游学

车水马龙的街道、人群拥挤的站台,城市快节奏的生活让本就燥热的夏日变得更加难耐。然而在被城市热岛效应围困的北京都市圈,却有一片净土,让你能够摆脱心中的烦躁,充分体会何为心静自然凉,那就是北京的胡同儿。

近日,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北京工业大学承办的“2019感知中国——北京古都风貌保护与复兴”活动就吸引了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的70余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走进北京的“老城”,走进史家胡同,感受独特的古都风貌,了解胡同里的中国故事。

## 保护共同的瑰宝

“史家胡同有‘一条胡同,半个中国’的美誉。参观胡同和四合院,了解胡同的历史变迁,希望国际友人们能直观感受胡同街道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胡同治理成果,感受被‘擦亮’的北京文化名片,感知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故事……”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看着台下坐着的几十名留学生,表达自己的期望。

李哲告诉台下的留学生们,在致力于胡同工作、老北京传统文化建筑保护方面的工作人员中,有很多都不是北京人,但是像在座的留学生一样,“早已把北京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这群人在用自己的力量,从越来越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把碎片化的传统文化保留、传承,延续到日常生活中。对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要,他希望在座的留学生也能够加入进来,保护传承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

事实上,北工大一直以来都有专门的团队致力于北京的城市规划与保护。北工大还作为主编单位,参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北京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与更新设计导则》的编制,开启了北工大科研团队为北京规划创新发展献计献策的新篇章。

“史家胡同45号院落公共空间提升改造项目就是北工大参与设计的项目,国际学生可以身临其境,亲身体会到北京‘老城’改造与更新和谐并举。希望通过此次感知中国活动,国际学生们能直观感知新时代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风貌保护与复兴举措,体验首都风范和古都风貌。”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高原介绍说。

留学生们听过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王虹光题为“社区培育与互通更新实践”的专题讲座,亲手触摸着胡同四合院内的砖瓦,看着被保护的老城,思考着何为文化、何为传承。

## “打卡”胡同四合院

对于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北京工业大学在读博士生欧艾达来说,胡同让她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民俗。“这里的建筑都很漂亮、很安静,让人有安全感。”欧艾达站在正在被修葺的四合院中,亲身感受这份宁静。

古韵的“门墩儿、方正的院子,点缀着茂密绿树,比起大栅栏的热闹喧嚣、南锣鼓巷的人山人海,安静宜居的胡同向留学生们展示着老北京生活的另一面,“老城”改造后的新面貌。

来自柬埔寨的首都经贸大学的国际学生伊瑞表示,很幸运能参加到体验北京风韵的活动中,“‘老城’并不老,专业的改造与更新让它更有活力”。

在一部分留学生“打卡”四合院的时候,还有一部分留学生走进了展示史家胡同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家胡同博物馆,了解胡同里的中国故事。

老式收音机、电视机、粮票、凤凰牌的二八自行车……对于前来参观的中国人而言,这些老物件勾起的往往是童年的回忆。“宝宝看到这个录音机了吗?妈妈小的时候家里的录音机就是这样的。”我爷爷用这个车带过我,我就坐在大梁上。”哇,过去的

# 胡同里感知中国故事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通讯员 张宇庆

汽车月票”……

听着不太熟悉的语言,看着这些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留学生们的眼中更多的是好奇和喜爱。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兴趣,这次活动让我提高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体验了北京老城改造、发展与变迁。”来自文莱的北京工业大学留学生安娜说。

从史家胡同博物馆里的史家胡同沙盘、老北京四合院的旧建筑构件,到大栅栏街道上荣宝斋大厦的苏式彩画、瑞成斋的窗棂艺术、华夏书社的旋子彩画……一天的时间,留学生们感受到了老北京的动与静、生活与商业,更身临其境感知中国的文化魅力。

## 感知中国力量

看着在胡同和院落中仔细探索、拍照留念的留学生们,北京工业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刘增华感到很欣慰,因为活动的目的达到了,留学生们不虚此行。

“感知中国”社会实践和文化体验活动是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开展的品牌活动,旨在增进国际学生对中国当代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而北工大成功承办“2017感知中国——创新京津”和“2018感知中国——首都名企的传承与创新”活动后,今年又推出“古都风貌保护与复兴”主题活动,旨在与学科专业相结合,进一步开拓国际学生视野,使学生们真切感受中国、北京古建筑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变迁,了解胡同文化与现代传承,也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和城市风貌中呈现的独特之美。

“感知中国活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举办,活动每一年的主题都不尽相同,今年是以历史文化为主题,又恰与我校城市规划保护团队的工作密切相关,于是我们选择了带领留学生走进胡同,大栅栏等具有老北京特色的地方,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国际友谊的纽带与桥梁。”刘增华说。

刘增华告诉《中国科学报》,此次活动让留学生走进中国社会深处,感受未修复的和正在修复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让他们了解中国历史上投入的力量。

在此次活动中,史家胡同博物馆还与北京工业大学合作,共建史家胡同“北京工业大学国际学生实习实践基地”。对此,刘增华表示,日后将有更多的国际学生参与到史家胡同博物馆文化交流和社区志愿服务之中,为美丽北京注入更多青春、包容的力量。

## 域外传真

# 填补数字化技能差距是每个人的责任

■斯蒂芬·萨默维尔

近日,英国开放大学发表了一份揭示性的报告,强调了数字技能差距的程度,以及该差距对组织、员工的影响。在填补数字鸿沟这一问题中,报告发现了许多不面对的现实——尤其是预计在未来五年中,37%的工作岗位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事实。

除此之外,该报告还警示,目前英国每10个组织中,就有9个缺乏数字化技能支撑,还有超过半数的英国组织报告称,数字化技能短缺已经对其生产力产生了负面影响。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未来图景无疑是“凄惨”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迹象表明,我们并没有完全准备好迎接目前所处的数字现实。下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数字化技能危机报告强调,英国23%的成年人缺乏基本的数字化技能,这直接导致了英国GDP每年损失630亿英镑。

英国国家科学、技术和艺术基金会(Nesta,一个支持多个部门创新的基金会)在其2018年的报告中,揭示了技能的未来:到2030年,有十分之一劳动力参与的职位将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约有五分之一的职业可能会面临缩减。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就业和技能的未来》也做出相似的预测,在今天进入小学学习的儿童中,其中65%未来将从事目前尚未存在的职业。

那么上述技能上的缺口需要由谁来填补呢?简言之,是我们所有人。

对于个人来讲,至少有责任确保自己为数字世界做好相应准备。如今,大量的线上资源可供参考,比如英国慕课平台(FutureLearn),再比如YouTube和Ted Talks上所有的知识,以及大学和科技公司为我们学习现代工作所需技能而提供的在线课

程,等等。

如上述自主性学习的兴起,证明了一个事实:许多人已经为适应现代工作承担起个人责任,特别是年轻一代对这种学习形式表现出了渴望。有相关报道称,目前,近一半的Z世代(指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10年前出生的人)他们又被称作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受访者更喜欢完全自主、独立的学习方式。

当然,企业也要负起责任。根据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只有三分之一(34%)的员工表示,他们的企业会为他们提供数字技能相关的支持或培训。当然,企业要承担的不仅仅是训练,它们有责任确定其组织中,最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规划的领域,并针对此提供必要的培训。

除了企业和个人,教育者们也同样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不仅仅

指在一个人上学的有限时间内,接受教育,然后从工作经验中学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教育者们需要考虑更多超越传统学位的东西,因为在需要模块化、可移动,并且在个人职业生涯中随时可访问的教育模式。

大学可以成为上述变革、弥补数字化鸿沟的重要参与者。大学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可以为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的服务。它们可以将部分产品数字化,以确保满足日益数字化的世界的需求。FutureLearn目前已经与全球四分之一的顶尖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对上述努力做出了承诺。的确,我们目前面临着一个数字化技能方面的鸿沟,但是凭借合力,最终能够将其填补。

(作者系英国慕课平台FutureLearn政府与企业合作关系常务董事,许悦编译)



留学生在参观史家胡同博物馆